

## 馬克思主義者应当如何對待 革命的羣眾運動

人民日報編者按：對待羣眾運動的態度問題，從來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爭論的根本問題之一。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這同樣是一個根本問題。

為了幫助讀者了解歷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這個問題的觀點，駁斥右傾機會主義者對羣眾運動的污蔑，我們選錄了兩部分材料，一部分是毛澤東同志的論述，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論述。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非常尊重羣眾的革命的創造性和主動性。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在不顧身積極創造世界歷史的行動”。馬克思主義者嘲笑資產階級的那種害怕羣眾、害怕羣眾運動的軟弱性和反動性。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當民眾還是保守的時候，是不免要害怕民眾愚鈍的，而在民眾一旦變得革命的時候，却又要害怕民眾覺悟了。”不錯，工人階級在革命中或在建設中是會遇到某些曲折和困難的，這是前進

中的曲折和困难，只要緊緊地依靠羣眾，發動羣眾的力量，就可能迅速地加以克服。資產階級的僕從們，譬如我們現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絲毫沒有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絲毫沒有克服困難的信心，而且對於我們專業發展中的某些困難譏諷嘲罵。列寧說得好：“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就指出了對羣眾運動的三種不同的態度：“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現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待羣眾運動，仍然有這三種不同態度的人。毛澤東同志堅決地反對把羣眾運動看成“糟得很”，而熱烈地歌頌羣眾運動是“好得很”。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個真理永遠不會過時。有的人之所以跌到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裏面，他們之所以倒臺，就因為他們不願意相信這個真理。

## 第一部分

### 毛澤東同志的論述

……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期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

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甜夢。……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羣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16—17頁）

……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羣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羣眾，細心地傾聽羣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羣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羣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羣眾之中；根據羣眾的覺悟程度，去啓發和提高羣眾的覺悟，在羣眾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羣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羣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羣眾的自願原則，害了

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廣大羣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羣众是否已經了解并且是否願意行动起來，要到羣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們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錯誤的，因为它落后于羣众的觉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羣众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羣众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时候，廣大羣众跑到我們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羣众的領導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見，并且將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羣众的意見，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應該使每个同志明了，共產党人的一切言論行动，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羣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廣大人民羣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應該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羣众的創造力是無窮無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們，而只会被我們所压倒。

（“論联合政府”，1945年。“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1090—1097頁）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羣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評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数不尽的清規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導農村中社会主义羣众运动的正确方針。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針，这是錯誤的方針。

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义。我們应当積極地热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

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干部中和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干部和農民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前進的，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農入社，不照顧貧農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強迫富裕中農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進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進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大胆指導運動，不要前怕龍，後怕虎。干部和農民在自己的鬥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幹。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前怕龍後怕虎的態度不能造就干部。

.....

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干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應當去挫折它。我們應當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干部和縣、區、鄉干部共命運，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積極性。

.....

在勝利面前，我認為有兩種不好：（1）勝利沖昏了頭腦，使自己的頭腦大大膨脹起來，犯出“左”的錯誤，這當然不好。（2）勝利吓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這也不好。現在的情況是屬於後一種，有些同志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

在發展的問題上，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說現在合作社的發展“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羣眾的覺悟水平”，這是不對的。

.....

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應當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

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黨是能够領導農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如果缺乏這種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第1—2、10、12、18、21頁）

那些不相信就一個一個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實現初級形式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號是羣眾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區可以和老解放區同時實現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蘇省崑山縣的這個鄉罷！這裡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兩年就合作化了。這裡不是老解放區，是一個千真萬確的晚解放區。這個晚解放區，走到許多老解放區的前面去了。有什麼辦法呢？難道可以把它拉回來嗎？當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認輸一法。羣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会主义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於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這種人難道我們遇見得還少嗎？這些只會循着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對於人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一種新事物出現，他們總是不贊成，首先反對一氣。隨後就是認輸，做一點自我批評。第二種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這兩種態度循環一遍。以後各種新事物出現，都按照這個格式處理。這種人老是被动，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那一個年頭能使這種人自己有辦法走路，並且走得象個樣子呢？有一個治好這種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羣眾中去走一走，看看羣眾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從其中找出先進經驗，加以推廣。這是一個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藥方，奉勸人們不妨試一試。

（“这个鄉兩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87—588頁）

几乎帶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羣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內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資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寫得恰好。作者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貧苦農民。有些人虽然頂着共產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現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業表現很少兴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羣众，反而向羣众的头上潑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國，正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决勝負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經過中國共產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會議表現出來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烟瘴气，陰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戶的農民羣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編者寫这几行的时候，全國已經有六千万以上的農戶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臉，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勝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許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29—730頁）

这是一篇动人的敘述，希望讀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別要請那些不相信廣大農民羣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積極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來“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現在全國農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長，廣大農民羣众要求組織合作社，羣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聰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領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許多地

方党的領導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級地方党委在这个問題上采取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主动立場，將整个農業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來，用積極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領導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龍那个故事，講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臨到社会主义跑來找他，他又害怕起來了。

（“一个違背領導意願由羣众自动办起來的合作社”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1204頁）

## 第二部分

###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論述

……誠然，資產階級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鈍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1851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1卷，第313頁）

如果你讀到我底“拿破侖第三政变記”底最末一章，你就可看見我說了这样的話：法國革命底下一次的企圖，不再是象从前一样，把官僚主义的軍國主义的机器从一手移轉于它手，而是要把它打碎；这是欧洲大陸上每一真正民众革命底先决条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党的同志們所企圖的，就是如此。这些巴黎人，是有何等的机动能力，何等的歷史的創造力，何等的自我牺牲的能力啊！經過了六个月的飢餓与破坏之后造成飢餓与破坏的，与其說是國外的敌人，不如說是國內的叛变，他們，在普魯士的刺刀下面革命起來，好象法國与德國沒有發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不在巴黎門前似的。在歷史上，还从來沒有过象这样偉大的例子。如



果他們歸于失敗，那只是由于他們底“寬容的性質”。在最先維諾衣後來巴黎國民軍底反動部分，都敗退到凡爾賽之後，他們應該立即向凡爾賽進軍。由于良心上的躊躇，他們喪失了時機。他們不願發動國內戰爭，好象那惡毒的妖物梯亥爾還沒有因企圖解除巴黎武裝而把內戰發動起來似的。第二個錯誤：中央委員會為要讓位給公社，而把權力放棄得太早。這又是由于“太過端正”，以至流于疑懼！雖是如此，這一次的巴黎起義——即使它被舊社會底狼、豬和惡狗們所壓倒——還是我們黨從巴黎六月起義以來的最光榮的行為。將這些巴黎底“翻天覆地”的英雄們，與德意志普魯士神聖羅馬帝國（它帶有染着兵營臭味、教堂臭味、士官貴族臭味、尤其是庸人臭味之因襲的假裝）底順天的奴才們比較一下罷。

（馬克思：“致顧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1871年。“法蘭西內戰”，第103—107頁）

至于我們，那末根據我們的全部過去，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在差不多四十年間，我們一直是最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最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強有力杠杆；所以我們決不能去和力求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起行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規定了一個戰鬥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去和公然說什麼工人太缺少教育程度來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慈善主義的大小資產者一手從上面解放出來的人們一起行走。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布拉克等人”，1879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485—486頁）

革命是歷史底火車頭，——馬克思這樣說過。革命是被壓迫

者与被剝削者底盛大節日。民众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如革命时期这样能表现为新社会制度底積極創造者。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儉漸進主义狹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議的奇迹。但在这样的時候，必須使革命党底領導者也更廣闊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任务，必須使他們的口号始終能發揚羣众底革命自动性，成为他們的灯塔，表明出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底全部偉大与全部光采，指明出达到絕對完全徹底勝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首先且讓無情的斗争來解决选择道路的問題吧。如果我們不利用羣众这种異常兴奋的毅力及其革命的热情來为直接坚决道路進行無情而奋勇的斗争，那我們就会成为叛变和出賣革命的人了。

（列寧：“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1905年。  
“列寧文选”兩卷集第1卷，第654—655頁）

馬克思对公社的評价是他給庫格曼的書信中的精華。拿这种評价來和俄國社会民主党右翼所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別有益处的。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十二月事件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

“本來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而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馬克思相比，說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对的，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請看看，普列漢諾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漢諾夫和馬克思有天淵之別。

在1905年11月，即俄國革命浪潮达到頂点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漢諾夫不但沒有坚决警告过無產階級，反而公开說必須学会掌握武器，必須武装起來。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經爆發的時候，普列漢諾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進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便馬上扮作悔过的知識分子說道：“本來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馬克思已在有名的國際宣言中直接警告过法國工人，說实行起义是愚蠢举动。他事前

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不需要动用武器”。

当他自己在9月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好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变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敌人，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教师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举动，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愚蠢举动，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世界历史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手转到另一手。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歷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歷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歷史主动性，一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

“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豈不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嗎？

馬克思當時雖然流亡在倫敦，但他卻以他特有的全部熱情投入了這一羣眾鬥爭，並且作為這一鬥爭的參加者來評價那些“奮不顧身的”、“決心沖天的”巴黎人所採取的直接步驟。

現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罵革命浪漫主義的“現實主義的”聰明才子們，在當時不知會怎樣譏笑馬克思！他們看到這位唯物主義者和經濟學家，這位烏托邦的敵人贊揚沖天的“嘗試”時，不知會怎樣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①看到這種所謂暴動意圖和烏托邦主義等等，看到對沖天的運動所做的這種估價時，不知會怎樣掉淚、冷笑或表示憐憫！

而馬克思絲毫沒有象絕頂聰明的鱗魚②那樣害怕討論革命鬥爭最高形式的技術問題。他正是討論起義的技術問題。是防禦，還是進攻呢？——他寫道。當時他好像是看見軍事行動就在倫敦附近發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說：一定要進攻，“本來是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

.....

馬克思警告領導者不要舉行尚未成熟的起義。但他對待決心沖天的無產階級，却是以實際的顧問，以羣眾鬥爭的參加者的姿態出現的，因為不管布朗基和蒲魯東的荒謬理論和錯誤怎樣，羣眾究竟把整個運動提到了更高的階段。

.....

馬克思沒有向無產階級隱諱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錯誤，他為這一偉大事業而寫的一部著作，至今還是“沖天的”鬥爭中最好的指南，同時也是自由派和激進派的“瘋豬”最害怕的東西。

---

① 套中人是契訶夫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是因循守舊的典型。

② 絕頂聰明的鱗魚出自謝德林的諷刺故事“絕頂聰明的鱗魚”，這是諷刺那些謹小慎微、混世度日、逃避鬥爭的人物的。

普列漢諾夫为十二月事变寫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憲民主党人的福音書。

.....

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做愚蠢举动。但当羣众已經起义了的时候，馬克思就願意同他們一起前進，同他們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學習，而不是訓誡他們，向他們打官腔。他懂得，誰想事先絕對确切地估計勝利的机会，誰就是有意欺騙，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藥。他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奋不顧身積極創造世界歷史的行動。馬克思观察世界歷史，是从正在創造歷史，但無法事先絕對准确地估計勝利机会的那些人們的观点出發的，而不是从瞎說“本來容易預察到……本來是不需要动用……”等等的庸俗知識分子的观点出發的。

同时，馬克思能够理解到歷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羣众進行的殊死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沒有勝利希望的事業，但对于進一步教育这些羣众，对于訓練这些羣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們現在那些冒牌馬克思主义者喜欢濫引馬克思的話，只願仿效他估計已往而不願仿效他創造未來，他們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这样一种問題提法。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沒有想到这样一种問題提法。

(列寧：“卡·馬克思致路·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1907年。“列寧全集”第12卷，第100—105頁)

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論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靜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進化的客观進程，同时又能非常堅決地承認羣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階級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組織、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力、革命首創精神的意義，并且把這兩方面卓越地結合起來。馬克思根据自己的全部歷史观点对人类發展的革命时期作了

很高的評價，因為正是在這種時期，解決了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許多矛盾。正是在這種時期，最有力地表現出了各個不同的階級在確定社會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建立了後來長期固定在更新了的生產關係基礎上的政治“上層建築”的根基。同時，馬克思和自由資產階級的理論家不同，他認為這種時期不是脫離了“正常”的道路，不是“社會病態”的表現，不是過激和謬誤的可悲的結果，而是人類社會歷史中最有生氣、最重要、最本質、最具有決定性的關頭。

（列寧：“反對抵制”，1907年。“列寧全集”第13卷，第19—20頁）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幾個月，即1870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工人說，推翻政府的嘗試是一種絕望的愚蠢舉動。但是，1871年3月，當工人被迫進行決戰，起義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儘管當時有種種惡兆，馬克思還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沒有用學究式的言論來非難“不合時宜的”運動，象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1月寫了一些鼓舞工人農民進行鬥爭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後，卻以自由主義的論調大叫其“本來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

然而，馬克思不僅是因為公社社員表現了如他所說的“翻天覆地”的英雄主義而感到愉快，雖然這次羣眾性的革命運動沒有達到目的，但是他在這次運動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定進步，看到了比幾百種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任務。

馬克思認為對“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

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員的革命經驗而做出的。

(列寧：“國家与革命”，1917年。“列寧全集”第25卷，第400—401頁)。

所以，同志們，如果你們这样观察問題，你們就不会讓資產階級及其走卒把你們引入歧途，他們的全部任务，就是散布驚慌和失望的情緒，制造对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气氛，把全部工作描画成毫無希望的事情，他們指出每一个別的無紀律和腐敗的情况，并且因为这些个别情况而鄙棄革命，似乎世界歷史上确实曾經發生过这样一次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沒有腐敗的現象，沒有違反紀律的現象，在羣众制定新紀律的时候沒有經過痛苦嘗試的步驟。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第一个接近了歷史的轉折点，在这个时候，新的紀律，劳动的紀律，同志关系的紀律，苏維埃的紀律，是真正由千百万被剝削的劳动者親自制定的。……而我們感到自豪的，就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全体劳动農民，正在尽力帮助这个破坏工作；这时羣众們已經自动地和本着自己的首創精神而日益觉悟到：他們不應該等待上面的命令，而應該根据自己生活經驗的指示去用联合起來的劳动的新紀律，用人口达几千万、几万万の俄國的联合起來的、有組織的工人和劳动農民的紀律，去代替那种建筑在对劳动者的剝削和奴役上的紀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務，但也是一个光荣的任務，因为只有在我们实际解决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們才能把那个正在被我們裝殮的資本主义社会最后封棺埋葬下去。

(列寧：“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18年。“列寧全集”第27卷，第388—389頁)

莫斯科——喀山鐵路工人的共產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各國人民擺脫資本桎梏和战争慘禍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紐

胞。

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慣于自命為“輿論”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當然要譏笑共產黨人的希望，稱這種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樹”，譏笑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次數同大量存在的盜竊公物、游手好閑、生產率低落、損毀原料和產品等等現象比較起來是微乎其微的。……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

如果從實質上來觀察問題，難道歷史上有一種新生產方式是不經過許許多多的失敗和反復的錯誤而一下子就發展起來的嗎？農奴制顛覆後過了半世紀，俄國農村仍有不少的農奴制殘余。美國廢除黑奴制度後過了半世紀，那里的黑人往往還處於半奴隸狀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始終保持替資本服務的本色，抓住虛偽透頂的論據；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前，他們責備我們是空想主義者，而在革命之後，他們却要求我們用荒唐的速度來鏟除舊制度的遺迹！

但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知道資產階級“論據”的真實價值，也知道舊東西的殘余在革命後的一定時期內還必然勝過新的幼芽。當新事物剛剛誕生時，舊事物在相當時期內總是比新事物強些，這在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的幼芽軟弱，抱着輕浮的知識分子的懷疑態度等等，——這一切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手段，是保護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我們應當縝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極仔細地對待它們，盡力幫助它們成長，並“照護”這些柔弱的幼芽。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列寧全集”第29卷，第386—387頁）



一切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它的內容总是比最优秀的政  
党、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丰富多采，更生動  
活潑，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鋒隊也只  
能表現几万人的意識、意志、热情和理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  
切聰明才智特別高漲和緊張的時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銳的階級  
斗争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热情和理想來實現的。由此可以  
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实际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任  
務，必須善于毫不遺漏地掌握社会活動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有时  
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險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沒  
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時刻準備着最迅速和突然  
地用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  
“列寧全集”第31卷，第77頁）

有些政党的理論家和領袖雖然知道各族人民的歷史，鑽研過  
革命歷史的始末，可是他們有时患着一種很不體面的病症。這種病  
症就叫做害怕羣眾，不相信羣眾的創造能力。在這個基礎上，有时  
就產生了領袖對羣眾的某種貴族態度，而羣眾雖然不熟悉革命歷  
史，却負有破壞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發勢力洶湧澎  
湃，怕羣眾“破壞得太多”，想充當保姆的角色，竭力照書本去教導  
羣眾，而不願意向羣眾學習，——這就是這種貴族態度的基礎。

列寧和這種領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象列寧  
這樣深信無產階級的創造力，深信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能適合於革  
命。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善于象列寧這樣無情地打擊那些傲  
然批評“革命的混亂狀態”和“羣眾的胡鬧行為”的人。我記得  
在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見說“革命後必須建立正常的  
秩序”，列寧諷刺地回答說：“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記了革  
命秩序是歷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